

唐代酒政略考

刘 荣

摘 要 作者通过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等传统文献史料,结合《敦煌文书》中有关酒政的史料,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略考唐代酒政。并得出唐代酒政的大框架,以及唐代政府对于民间的“榷酒”政策,为后世的统治王朝开创了一种新的敛财手段。而其方法与形式也在这个时候得以形成定制,即“榷麴”和“沽酒”。而这也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剥削的一种手段,一种苛政。

关键词 唐代 酒政 酒税 榷麴 沽酒

范文澜先生在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中把唐朝划分为三个时间段:第一个时间段,是唐初期的繁盛时期,以“租庸调”的形式,征收地税和人口税;

第二个时间段,是唐中期。唐中央政府由于受到内部藩镇势力和外部吐蕃、回纥、南诏势力的联合挤压。而税赋也因为战争、地方管理软弱等原因,不得不通过开征“两税、榷酒、茶盐”等以征收杂税(或商税)为主;

第三个时间段,是唐晚期。由于外部吐蕃、南诏、回纥等的衰落,内部藩镇与中央的相互妥协而趋于表面的缓和,但是,中央内部的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斗争(就如同东汉后期一样)又成了当时的主要矛盾。唐朝的政治在此时已经趋于极度的腐朽,而唐中期所遗留下来的“两税、榷酒、茶盐”等杂税,在此时也只能表现为种种的“苛政”。

自从唐德宗重开“榷酒”之后,该项税收政策由此延续至今。虽然,有所变化,但其本质性不变。因此笔者从略考唐酒政来探讨它形成的过程。

一、唐中期酒政考

经过内部藩镇势力和外部“蛮族”势力双重打压后的唐政府,在中期已经不能够再依靠传统的“地税和人口税”。因此,出于寻找新的税收来源,唐中期的酒政自然也就成为当时政府所关注的一项。

1. 唐政府管理酒务的方式。

正如《新唐书》卷 51,志第 36,百官 1 中记载:“户部……掌天下土地、人民、钱谷之政、贡赋之差。其属有四:一曰户部,二曰度支,三曰金部,四曰仓部。……度支郎中、员外郎各一人,掌天下租赋、物产丰约之宜、水陆道涂之利,岁计所出而支调之,以近及远,与中书门下议定乃奏。”

《新唐书》卷 53,志第 38,百官 3 记载:“良酝署……掌供五齐、三酒。享太庙,则供郁鬯以实六彝,进御,则供春暴、秋清、醑麋、桑落之酒。有府三人,史六人,监事二人,掌酝二十人,酒匠十三人,奉觶百二十人,掌固四人。”

《新唐书》卷 54,志第 39 上,百官 4 记载:“食官署……掌饮膳、酒醴。凡四时供送设食皆颛焉。供六品以下元日、寒食、冬至食于家厨厨者。有府二人,史四人,掌膳四人,供膳百四十人,奉觶三十人。”

从“酒政”所针对的对象角度看,酒的管理基本有两种方式:

一是针对政府官吏,或者说是统治阶级的酒政。由于酒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性质,因此统治阶级需要诸如“良酝署”、“食官署”之类专门负责酿酒的部门。而这也组成了为统治阶级自身酒务管理服务的部门,而其中的“酒匠”最后也慢慢演成了“酒户”。

二是针对普通百姓,或者说被统治阶级。根据上面的史料我们看到,唐朝政府在这里通过“户部”的“度支属”管理民间的酒

政,而这正是“榷酒”政策的执行单位。

这两种管理模式,则成为以后各朝政府对于酒政管理的基本模式。即:权贵们可以享受自己的佳酿,而普通人则要为这种传统的习惯付出沉重的赋税。

这种自王莽后一直被认为是“苛政”的酒政,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正式进入中国的赋税体系,并很快成为了当时一种极其重要的税收。

2. 德宗朝酒政。

《旧唐书》卷 12,本纪第 12,德宗上记载:“(代宗大历十四年)辛卯,罢天下榷酒。”^[2]可见,唐代的酒政并不是始于德宗朝。但是,酒税成为一种沉重的赋税则是从此开始。并且,德宗一朝还是唐中央政府能够正常运转的时候,此后唐中央政局渐渐为宦官所控制。因此,财税政策多是沿用此时的,所以从这里考略榷酒的发展应当是比较合理的。

上面提到唐朝的酒政拥有两个体系:一为对政府,二为对人民。而下面所要考略的则是对于人民的酒税政策。并且我们已经知道了,“酒政”的执行单位是唐中央“户部”的“度支属”。通过考略德宗一朝掌握户部的高级官员,会发现他们基本是兼领“判度支”之职的。而笔者将其整理成表格以便下面论述之用。(见表一)

表一:

序位	财政之臣	任职时间段	出处
1	韩滉和刘晏	大历十四年五月之前	321 页
2	刘晏	大历十四年五月至建中元年三月	325 页
3	韩洄	建中元年三月至建中二年十一月	325 页
4	杜佑	建中二年十一月至建中三年五月	331 页
5	赵赞	建中三年五月至建中四年十二月	333 页
6	裴腆	建中四年十二月至光元元年九月	338 页
7	元琇	光元元年九月至贞元二年二月	346 页
8	李竦	贞元二年二月至贞元二年十二月	352 页
9	韩滉	贞元二年十二月至贞元三年春(卒)	355 页
10	班宏和张滂	贞元五年二月至贞元九年五月	367 页、373 页
11	裴延龄	贞元九年五月至贞元十六年九月	376 页
12	王绍	贞元十六年九月	392 页

(注 班宏和张滂、裴延龄、王绍时,以他们兼领判度支为主,还有崔从质等人则不在此表。)

我们发现,德宗初期对于财政之臣的变动还是较频繁的,大约一年一换。并且也有诸如“剑南岁贡春酒十斛,罢之”^[1]、“丙戌,诏禁天下不得贡珍禽异兽,银器勿以金饰”^[2]之类的政策。因此在刘晏执掌度支属的时候会有“(代宗大历十四年)辛卯,罢天下榷酒”^[3]的政策。

但是,毕竟内忧外患的唐政府,对于财政的需求也只能因其“国用”的需求而定。当其与吐蕃等国以及国内藩镇矛盾尖锐的时候,之前所免的赋税则也会很自然的加以恢复,而新的赋税也应运而生。

3. 德宗朝税赋的减免与附加。

如上所论述,德宗朝的赋税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,下面笔者将其条列于下:

第一条:“(代宗大历十四年)辛卯,罢天下榷酒。”^[2]

第二条:“(建中元年春正月)自艰难以来,征赋名目颇多。今后除两税外,率一钱,以枉法论。”^[3]

第三条:“(建中三年)五月丙戌,增两税、盐榷钱,两税每贯增二百,盐每斗增一百。”^[4]

第四条:“(建中三年九月)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,每贯税二十文,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,以充常平之本。”^[5]

第五条:“(建中四年)六月庚戌,初税屋间杂,除陌钱。”^[6]

第六条:“(贞元二年冬十月)壬申,京城畿内榷酒,每斗榷钱一百五十文,鬻酒户差役,从度支奏也。”^[7]

第七条:“(贞元九年春正月)癸卯,初茶税,岁得钱40万贯。”^[8]

自从建中三年以后,第二条史料所引的诏书已经成为一纸空文。而德宗后期较之以前的税赋不但加重了,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新的税种。其中的酒税,从史料中会发现它时常与“两税、盐铁”并名。虽不能算是新加的税种,但它的确是有所加重,并开始成为一种主要的税收。而这也进一步说明了,唐中后期主要税收已经开始从传统意义上的“田税和人头税”演进成为“各种杂税(或商税)”,并逐渐加重。当然这也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所致。

由此可见,德宗一朝订立的财政政策,是为后世的剥削阶层指引了一条相当明确的敛财策略,而百姓则很自然成了这些不合理税赋的买单者。那么之后赋税政策的混乱,则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。

二、唐后期酒政微考

1. “酒税”开始的时间。

在论述之前,笔者需要做一个传统的历史学考证,明确唐之“酒政”是否真的始于唐德宗年间。

第一条:出自于《新唐书》卷7,本纪第7中的,建中三年正月辛未,复“榷酤”。

第二条:出自于《旧唐书》卷49,志第29,食货志下中的,“建中三年,初榷酒”。

第三条:则是“(贞元二年冬十月)壬申,京城畿内榷酒,每斗榷钱一百五十文,鬻酒户差役,从度支奏也”。而这仍然出自《旧唐书》。

看到这里,我们开始对史料进行怀疑了。连所谓的正史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推行年代记载,那么它们的可信度又在什么地方呢?

通过表一,我们会很容易的看到,如果是“建中三年”的事,那么当时主管的财务大臣应当是杜佑,而如果是“贞元二年”的事,则主管的大臣应当是韩滉。

而在刘晏执掌财政的时候,德宗曾下诏“罢天下榷酒”,但是

较之“建中三年”离“罢天下榷酒”过于近,且此时唐德宗的财政大臣更换频率较高,因此可能性不是很大。而到了韩滉重新担任财政大臣的“贞元二年”,则由于其与刘晏一同掌管过天下财政,看上去重开“榷酒”的可能性很大。因此,我们更加相信《旧唐书》中德宗本纪所记述的“榷酒”时间和顺序。

如果非要给一个模糊的概念,那么德宗年间已有“榷酒”无疑是正确的。而期间所确立的制度也正如前面所说的。

2. 从“敦煌文书”中微考唐后期酒政。

正如前面对于德宗时榷酒时间的略考,让我们意识到单纯的史料已经不能够证明一件历史事件的准确性。因此,笔者在这里引用敦煌文书中有关的史料,加以佐证。

第一条出自于“天宝年间”:

敦煌文书 P.4979 背《唐天宝十载(751)二月敦煌郡酒行安胡到芬牒》云:“酒行状上,供糟廿瓮。右胡到芬比日在于市纳沽酒经纪,缘无本产,伏承经今廿日了(原料)造酒,请乞给价直(值),谨状。牒件状如前,谨牒。天宝十载二月日酒行安胡到芬……二月廿三日付生绢一,准时(估)伍佰捌拾文。余欠于沽等用。”

第二条出于《旧唐书》卷49,志第29,食货下,会昌六年九月敕:“扬州等八道州府,置榷酤,并置官店沽酒,代百姓纳榷酒钱,并充资助军用,各有榷许限。扬州、陈许、汴州、襄州、河东五处榷酤,浙西、浙东、鄂岳三处置官沽酒。……”

从第一条史料,已能证明《旧唐书》德宗本纪记录的有关什么时候“初榷”也就不说自明了。而第二条史料则是很明确的让我们对于唐代的“榷酒”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即唐代对于民间征收酒税拥有两种形式:一为榷酤,二为沽酒。

榷酤在后代的酒政中也是经常见到的政策,是政府通过征收和控制酒麴的酿造来控制酒税的征收。

沽酒的方法,通过敦煌文书的记载已经很明白了,就是“置官店沽酒,代百姓纳榷酒钱”,说明白就是政府通过酒类的专卖来获取巨大的商业利润,而这也就是一种变相的酒税。

3. 唐代酒税的重要性略考。

正如范文澜先生在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中所述:“唐中后期的财政,因为藩镇的割据,所以传统的地税和口税,已经无法进行正式的征收,因此商税等杂课自然也就成了政府征收的重点。”

这也提醒我们,“酒税”政策虽然在德宗朝确立,但是它对于唐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又如何,则是我们下面应重点考虑的。

通过《旧唐书》中,有关德宗、宪宗、穆宗、武宗四朝史料的记述,我们发现唐中后期所开“酒税”等杂税,往往出于中央财政的困难,或者以资军用。

正如《旧唐书》卷16,本纪第16,穆宗,癸卯,诏:“以国用不足,应天下两税、盐利、榷酒、税茶及户部阙官、除陌等钱,兼诸道杂榷税等,应合送上都及留州、留使、诸道支用、诸司使职掌人课料等钱,并每贯除旧垫陌外,量抽五十文。仍委本道、本司、本使据数逐季收计。其诸道钱便差纲部送付度支收管,待国用稍充,即依旧制。其京百司俸料、文官已抽修国学,不可重有抽取。武官所给校簿,亦不在抽取之限。”我们可以看到酒税已经与两税、盐利、税茶等税收相提并论了。

这也正是下面四条史料所反映的史实:

第一条:《旧唐书》卷13,本纪第13,德宗下:“十四年春正月壬午朔,庚寅,诏诸道州府应贞元八年至十一年两税及榷酒钱,在百姓腹内者,总五百六十万七千贯,并除放。”“史臣曰:德宗皇帝初总万机,励精治道……解鹰犬而放伶伦,止榷酤而绝贡奉。”

第二条:《旧唐书》卷15,本纪第15,宪宗下:“京畿今年秋税、青苗、榷酒等钱,每贯量放四百文。”

第三条:《旧唐书》卷16,本纪第16,穆宗:“辛未,兵部尚书杨于陵总百僚钱货轻重之议,取天下两税、榷酒、盐利等,悉以布帛任土所产物充税,并不征见钱,则物渐重,钱渐轻,农人见免贱卖匹段。”

第四条:《旧唐书》卷19,本纪第19,武宗,十月丙寅,户部侍郎、判度支崔彦昭奏:“当司应收管江、淮诸道州府咸通八年已前两税榷酒及支米价,并二十文除陌诸色属省钱,准旧例逐年商人投状便换。自南蛮用兵已来,置供军使,当司在诸州府场监钱,犹有商人便换,贵省司便换文牒至本州府请领,皆被诸州府称准供军使指挥占留。以此商人疑惑,乃致当司支用不充。乞下诸道州府场监院依限送纳及给还商人,不得托称占留者。”

而“酒税”的地位,也随着它的征收越来越重要,这也正如下面的史料所反映:

第一条:《旧唐书》卷165,“侑以军赋有余,赋不上供,非法也,乃上表起大和七年,请岁供两税、榷酒等钱十五万贯、粟五万石。”

第二条:《旧唐书》卷174,“贞元中,李絳任观察使日,职兼盐铁,百姓除随贡出榷酒钱外,更置官酤,两重纳榷,获利至厚。”“至薛苹任观察使时,又奏置榷酒,上供之外,颇有余财,军用之间,实为优足。”

第三条:《旧唐书》卷49,志第29,食货下:“建中三年,初榷酒,天下悉令官酿。”^[9]和元和六年六月,京兆府奏:“榷酒钱除正酒户外,一切随两税青苗据贯均率。”^[10]

而武宗朝时对于私酿打击的史料记载,则是从侧面反映酒税的重要性。

正如《旧唐书》卷49,志第29,食货下,会昌六年九月敕:“……如闻禁止私酤,过于严酷,一人违犯,连累数家,闾里之间,不免咨怨。宜从今以后,如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麴者,但许罪止一身,并所由容纵,任据罪处分。乡井之内,如不知情,并不得追扰。其所犯之人,任用重典,兼不得没入家产。”

正是由于“酒税”和“盐铁”、“茶税”等拥有几乎同等的地位,因此,它的推行得以越来越趋于完善与复杂。而它所带来的剥削也自然越来越重。这也是之后的宋辽金代时代,为什么政府会重

视“酒税”的原因。而“酒户”自然也在当时得到了大的扩张。

可以说“榷麴”和“沽酒”并行的方法是一种创新,到了两宋时候已经演进成了两种独立的体系,即“对于城市进行沽酒”,“对于乡间百姓进行榷麴”。暂且不说酒税的好与坏,单看这种制度的不断完善,已经可以证明中国的政治体系演进的连续性和合理性。

三、唐代酒政考略的结论与作用

笔者通过简单的考证,初步明确了唐代酒政的大框架,即:

第一,唐代政府拥有其自己酿造单位。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酒是一种“礼节性的”商品,而这也就是它的特殊性所在。

第二,唐代政府对于民间的“榷酒”政策,为后世的王朝开创了一种新的敛财手段。而其方法与形式也在这个时候得以形成定制,即“榷麴”和“沽酒”。这也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剥削的一种手段,一种苛政。

后世的“五代与两宋”、“辽与金”、“蒙元”时期,酒政一直作为一种重要的税收存在。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,税收种类的进一步完善,“酒税”失去主要税种的功能,但是,它的剥削性不得让我们反思。因为酒是我们民族传统的“礼节性”物品,如果对其征收重税,虽然能够聚敛大量财富,但是其结果必然与王莽时略同。因此自“王莽”后,统治者也就不再提榷酒之事,史书上也称其为“苛政”。那么,随着唐德宗后,榷酒制度的确立,人民负担更加沉重。

参考文献:

[1][2][3][4][5][6][7][8][9][10]刘昫等.旧唐书[M].上海:中华书局,1975.320,322,324,333,335,336,355,376,2130,2130.

刘 荣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
(责编 一 溪)

(上接第131页)

双刃剑[J].上海大学学报,2005,(1).

[8][27]韩非子·五蠹.

[9]孟子·滕文公上.

[10]易传·系辞上传.

[11]原道.

[12]管子·七臣七主.

[13]管子·君臣上.

[14]管子·形势解.

[15]管子·牧民.

[16]孟子·离娄上.

[17]孟子·尽心下.

[18]廿二史札记.

[19]尚书·五子之歌.

[20]管子·霸言.

[21]四书集注.

[22]慎言·御民篇.

[23]孟子·公孙丑章下.

[24]朱子语类(卷一).

[25]周易·丰卦.

[26]周易·杂卦.

[28]读通鉴论(卷一).

[29]墨子·尚同上.

[30]韩非子·扬权.

[31]礼记·坊记.

[32]汉书·王吉传.

[33]汉书·董仲舒传.

[34]王子今.史门内外——评郭成望著《中国帝国的兴起》[J].博览群书,2007,(7).

[35]史记·滑稽列传.

[36]张子侠.“大一统”思想的萌生及其发展[J].学习与探索,2007,(4).

李修贵 安徽大学历史系 硕士研究生

安徽省太和县第二中学 一级教师

(责编 一 溪)